

斟寻、斟灌地望变迁及其所见夏人东进之历史

张 靖

提 要：夏代太康、羿、桀所居的斟寻当在今河南省巩义县西南芝田镇的稍柴村与小砦殿村附近，斟灌在河南清丰县南五里。夏代中后期，夏人在国力上对东夷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原来河南巩义的斟寻、清丰的斟灌两个地名被带到了山东潍坊、寿光，地名迁移的背后，反映了夏人向东扩展的历史。

关键词：斟寻 斟灌 古本《竹书纪年》 五观 二里头文化

一 学者对斟寻、斟灌位置认识的分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与地理问题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方面。民族迁徙会将原居地旧名用来命名新居地，探讨先秦历史地理中的异地同名现象是研究早期中华民族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献记载河南、山东皆有斟寻、斟灌，斟寻、斟灌地理位置的变迁是研究夏代民族与地理的典型案例。由于记载夏代历史文献简略以及历史学与考古学整合程度有限，又由于研究主体对夏族起源与夏代政治中心的整体判断较大影响到他们对夏代地理与民族的考证，仅围绕斟寻、斟灌地理位置以及河南与山东的斟寻、斟灌的关系就存在较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斟寻的位置。首先，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羿居斟寻、桀居斟寻”中斟寻的位置^①，雷学淇认为在河南巩县西南的寻中^②；杨向奎认为在山东潍坊^③；沈长云认为在河南范县、山东曹县之间。^④其次，二里头遗址是不是斟寻？陈旭认为是^⑤，邹衡认为不是，稍柴遗址可能是斟寻。^⑥最后，《左传》及杜预《集解》认为相居斟灌时依同姓斟灌氏、斟寻氏^⑦，雷学淇认为相所依者只有斟灌氏，没有斟寻氏。^⑧

二是斟灌的位置及斟灌氏的形成。首先，古本《竹书纪年》“相居斟灌”中斟灌的位置，第一类，段玉裁等持斟灌在洛汭说^⑨；第二类，斟灌在西汉东郡观县说，顾颉刚认为在清代山东曹

① 参见《史记》卷2《夏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标点本，第107页。

②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81—84页。

③ 参见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6、7合期。

④ 参见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济河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

⑤ 参见陈旭：《二里头遗址是商都还是夏都》，《夏商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⑥ 参见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

⑦ 参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5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4678—4679页。

⑧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82页。

⑨ 参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32，清乾隆道光间段氏经韵楼丛书本，第5—6页；闻一多：《天问疏证》，三联书店，1980年，第58页。

州府观城县西古观城^①，即今聊城莘县观城镇，杨守敬、史念海认为在河南清丰县南（五里）^②；第三类，雷学淇认为斟灌初在观城县，后迁海滨，遇浞浇之凶始灭覆^③；第四类，斟灌在山东说，辛德勇认为相居斟灌在寿光^④，陈絮考证斟灌在汶河下游沿岸。^⑤其次，对古本《竹书纪年》“启征西河”及《左传》“夏有观扈”的理解，雷学淇认为启征西河指启之季子武观据西河畔，王命彭伯寿征之^⑥；顾颉刚认为启征西河即征观国。^⑦最后，对斟灌氏、《楚语》《墨子》“五（武）观”及《尝麦》《离骚》“五子”的理解，雷学淇认为五观是启封于观的第五子，即后相所依的斟灌氏^⑧；全祖望认为“五观”如同三媪只不过是国名，是“观扈”之观，即姚姓观国^⑨；闻一多认为“观扈”就是“五观”，是启的姪子。^⑩

三是河南的斟寻、斟灌与山东潍水流域的斟寻、斟灌孰先孰后以及是否存在关系。第一，夏族的政治中心所在或夏王朝统治范围，顾颉刚认为夏代政治中心始终未远离河南一省^⑪，邹衡认为豫西为夏人活动的大本营与夏王朝中心统治区，晋西南是夏王朝的重要统治区，邹氏特别强调夏王朝的统辖区域未及山东半岛^⑫；王国维、沈长云认为夏族主要活动在或起源于豫东北鲁西（古河济之间）^⑬；杨向奎认为夏代中世以前政治中心在山东省，晚期移居河东及伊洛流域。^⑭第二，夏王朝在疆域上开拓与发展的方向，顾颉刚认为夏人与东夷交往密切，夏人从伊洛盆地向东方发展^⑮；沈长云认为夏人一直活动在豫东北鲁西，夏代中期曾一度居于伊洛盆地的二里头遗址。^⑯

① 参见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中华书局，2011年，第855—856页。

② 参见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6，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64页；史念海：《中国古都与文化》，《史念海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9页。

③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78页。

④ 参见辛德勇：《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资料的初步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5—197页。

⑤ 参见陈絮：《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⑥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77页。

⑦ 参见顾颉刚：《夏史三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562页。

⑧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77页。

⑨ 参见全祖望：《经史问答》卷2，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第3—5页。

⑩ 参见闻一多：《天问疏证》，第58页。

⑪ 参见顾颉刚：《法华读书记》（十四）《夏都均在河南，山西之为大夏当在夏亡后》，《顾颉刚读书笔记》卷6，中华书局，2011年，第26页。

⑫ 参见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第232、128—129页；《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6—37页。

⑬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王国维遗书》，第1册，上海书店，2011年，第489—490页；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济河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沈长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观察》，《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⑭ 参见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6、7合期；杨向奎：《大禹与夏后氏》，《杨向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148页。按：史念海、顾颉刚等在1936—1937年合作完成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第3章夏民族之历史传说及其活动范围第2、3节完全采用杨向奎的意见，见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6，第14—18页。

⑮ 参见顾颉刚：《法华读书记》（十四）《夏向东发展，故与夷人多关系》，《顾颉刚读书笔记》卷6，第27页。

⑯ 参见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济河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

第三，雷学淇认为太康居斟寻而斟寻国得迁于潍水，相居斟灌而斟灌国得迁于寿光^①，顾颉刚对斟寻、斟灌何时从河南披名于山东表示阙疑。^②

本文一方面充分利用考古报告与吸收考古学研究成果，一方面注重对文献地理自身的考辨及对往说的检讨，以坚实可信的文献为基础考证太康所居斟寻、夏后相所居斟灌的位置，辨析斟寻、斟灌在河南、山东出现的先后顺序，通过对夏代都邑的整体把握来考察夏代政治中心、发展方向及夷夏关系，讨论斟寻、斟灌从河南披冠于山东潍水流域发生的具体历史形势。

典籍中斟寻、斟灌写法不一，斟字或作斗，寻或作邗，后增邑符为城邑专名，灌或作观，灌、观皆从藿得声而通用。若非引用原文者，本文一般皆写作斟寻、斟灌。

二 斟寻地望考证

（一）斟寻地理位置诸说之检讨

一是应劭斟寻在今山东潍坊昌乐东南说。《汉书·地理志》北海郡平寿县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古斗寻，禹后，今斗城是也。”寿光县颜注引应劭曰：“古斗灌，禹后，今灌亭是。”^③依应氏说，西汉平寿县斗城是古斗寻，西汉寿光县灌亭是古斗灌。司马彪直接继承应劭说，《续汉书·郡国志》北海国：“平寿：有斟城。”乐安国：“寿光故属北海，有灌亭。”^④杜预亦采纳应劭说，《左传》哀公元年（前494）杜注：“二斟，夏同姓诸侯。”^⑤襄公四年杜注：“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⑥汉平寿县在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东南，有斟寻之名；汉寿光县在今山东省寿光市东北，有斟灌之名。

考古学界公认邹衡提出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皆为夏文化之说。^⑦二里头文化自豫西龙山文化脱胎而来^⑧，更加具体说，主要由嵩山南北的临汝煤山文化与洛阳王湾三期文化发展而来。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山东半岛的文化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属于东夷族文化，时代略晚于二里头文化，故太康之都斟寻不可能在山东潍坊。

二是薛瓚斟寻在河南洛阳巩县西南说。晋唐史注引薛瓚注斟寻者较多。《水经·巨洋水注》：“薛瓚《汉书集注》云：‘按《汲郡古文》……又云：“大康居斗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⑨《尚书序》云：“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大康所居为近洛也。”^⑩《汉书·地理志》北海郡平寿县颜注：“臣瓚曰：‘斗寻在河南，不在此也。’”^⑩《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

①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92页。

② 参见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55—856页。

③ 《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584页。

④ 《续汉书·郡国志四》，《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473页。

⑤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78页。

⑥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5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96页。

⑦ 参见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第120—127页；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第18页；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第2版），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66页。

⑧ 邹衡：《中国文明的开始》，《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再续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⑨ 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6，第2218—2219页。

⑩ 《汉书》卷28《地理志》，第1584页。

义：“臣瓚曰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①薛瓚明确反对太康所居之斟寻在平寿说。张守节言“臣瓚曰斟寻在河南”，此诚为薛瓚的见解，“盖后迁北海”则为张氏的意见。学界一般从臣瓚斟寻在巩县西南说。^②

三是皇甫谧斟寻在河南濮阳说。皇甫谧以为斟寻在河南濮阳附近。《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纪》云：“帝相徙于（商）〔帝〕丘，依同姓诸侯斟寻。”^③皇甫谧主张斟寻在帝丘附近，故相徙帝丘而能依之。《水经·巨洋水注》：“（皇甫谧）又云‘夏相徙（商）〔帝〕丘，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即《汲冢书》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寻，明（斟）〔灌〕、寻非一居矣。”^④帝丘为春秋卫都，在今濮阳西南，则斟寻就在濮阳附近。

皇甫谧以斟寻在帝丘附近说的依据，笔者认为当是《左传》襄公四年（前569）“（浞）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与哀公元年“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郟，灭夏后相”两条材料。^⑤沈长云据《左传》推斟寻在豫东北与鲁西交界一带。^⑥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皆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从豫西的王湾三期文化与煤山文化发展而来；龙山时代末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濮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后岗二期文化、漳河型文化，故夏族不可能起源于古河济之间；太康所居的斟寻位于濮阳说实无考古依据。

四是酈道元斟寻本在河南洛阳巩县西南后迁北海。面对薛瓚与应劭相互冲突的意见，酈道元开启调和两家之论调。《水经·巨洋水注》曰：“余考瓚所据，今河南有寻地，卫国有观土……是盖寓其居而生其称，宅其业而表其邑，纵遗文沿递，亭郭有传，未可以彼有灌日，谓专此为非，舍此寻名，而专彼为是。”^⑦酈道元经过一番考证认为北魏河南有寻地，卫国县有观地，故酈氏相当赞同臣瓚之太康所居之斟寻在河南说与相居斟灌在东郡观说。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北海郡平寿、寿光二县之下皆无自注，而平寿有斟寻、寿光有斟灌之说实出于应劭之口。除了《汉书·地理志》北海郡斟县班固自注“故国，禹后”之外，确实暂未见有能佐证应劭说之材料。酈道元调和二家之说，既承认河南、卫国有斟寻、斟灌，也支持平寿、寿光有斟寻、斟灌；张守节发挥了酈道元的见解，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与视野，用“盖后迁北海”一句话就初步解释了河南与山东皆有斟寻、斟灌的原因。

综上所述，斟寻在河南巩县说更为可信。

（二）斟寻的具体位置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前519）：“癸卯，郊郟溃。”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郟中。”^⑧杜预认为东周王畿的寻邑在寻中。《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故郟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张守节以故郟城为斟寻之所在。雷学淇认为寻中、故寻城为斟寻之所在。^⑨寻中的位置，《水经注·洛水注》言之凿凿，故寻城的位置，《括地志》连具体的里

① 《史记》卷2《夏本纪》，第107页。

② 参见辛德勇：《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资料的初步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第192—193页。

③ 《史记》卷2《夏本纪》，第107页。

④ 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6，第2219页。

⑤ 参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96页；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5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78—4679页。

⑥ 参见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济河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⑦ 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6，第2219—2220页。

⑧ 参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5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564页。

⑨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81—82页。

数都记载地很明白。

《水经·洛水注》：“洛水又北，迳偃师城东，东北历郟中，水南谓之南郟，亦曰上郟也。迳訾城西，司马彪所谓訾聚也，而郟水注之。水出北山郟溪，其水南流，世谓之温泉水，水侧有僵人穴……郟水又东南，于訾城西北，东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巩洛渡北有郟谷水，东入洛，谓之下郟，故有上郟、下郟之名；亦谓之北郟，于是有南郟、北郟之称矣。”^① 自此可知，第一，洛水迳偃师城东，东北流历寻中，寻中在偃师城东方向似无问题，第二，以洛水所经过的寻中为界，其北为北寻、下寻，其南为南寻、上寻。第三，寻水先南流，再东南流，在訾城西北汇入洛水。参照杨守敬《水经注图》（见附图1），可知寻中在今小訾殿村西南1.5公里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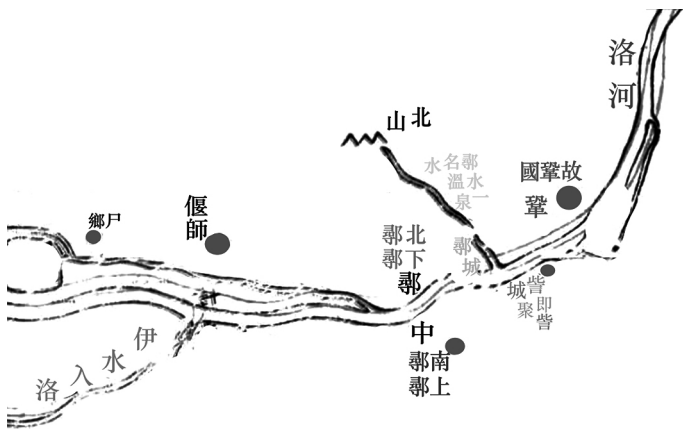


图1 斟寻位置示意图

说明：据杨守敬《水经注图》（中华书局，2009年，第200页）修改

西汉河南郡巩县为古巩县，隋开皇十六年（596）复置的巩县为今巩县，在今巩义市东北站街镇西老城村。根据对长安城的实际测量计算，唐代1里大为530米，小里为440.7米。^②《括地志》言故寻城在巩县西南58里，按唐代小里计算，这58里相当25.5公里。自今站街镇杜甫故里景区为起点向西南以直线延伸，至今日小訾殿村有18.5公里，至伊水入洛处有26.6公里，至今伊洛河大桥有25公里。若是《括地志》记载的58里无误，又古今里数兑换准确无误，寻城在伊水入洛处东1公里之地，此地在今洛阳市偃师区东南5.4公里，在偃师老城东南有3—4公里。雷学淇综合诸书考证说“寻邑故址在今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在古县故城西南二十八里”，问题不大，但是雷氏说寻邑故址“（在）东訾故城西南五十八里，在偃师县东北十三里”^③，则显然不对。

依照《括地志》的里数计算出的寻城的位置与《水经注》洛水所经的寻中位置存在细微的

①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15，第1322—1323页。

② 参见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③ 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82—83页。

偏差, 纵然按照《括地志》之说, 寻城也仍在偃师老城东南方向, 考古发掘的二里头遗址在今洛阳市偃师区西南9公里, 二里头遗址与寻城、寻中显然不在一地。

巩义市芝田镇稍柴村南、小訾殿村东1.5公里发掘出稍柴遗址, 规模有100万平方米, 专家认为稍柴遗址一至三期相当二里头一到三期文化。^① 邹衡等认为稍柴遗址可能就是斟寻。^② 虽然自站街镇至稍柴遗址的直线距离尽管只有18公里, 与《括地志》记载寻城至巩县有58里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自稍柴遗址的位置确实很符合《水经》寻中的位置。

三 斟灌与斟灌氏

杜预《集解》云: “禹孙太康, 淫放失国, 夏人立起弟仲康。仲康亦微弱, 仲康卒, 子相立, 羿遂代相, 号曰有穷。”^③ 依杜预之说, 太康失国, 夏人立仲康, 仲康卒, 后羿立夏后相, 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 相为禹所迫徙都帝丘。寒浞杀羿而当政, 相与寒浞对峙, 浞子浇灭相于斟灌, 历史进入寒浞统治期。古本《竹书纪年》说: “太康居斟寻, 羿亦居之。”羿、浞的政治中心就在斟寻。后相之都邑有帝丘与斟灌, 自浇灭斟灌而后相亡可知相先居帝丘, 后居斟灌。以下略论斟灌地理问题。

(一) 斟灌地望诸说

一是汉观县说。薛瓚认为斟灌在汉东郡观县。《水经·巨洋水注》引薛瓚《汉书集注》: “《汲郡古文》‘相居斟灌’, 东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后, 改曰卫。”^④ 《汉书·地理志》东郡: “观, 莽曰观治。”^⑤ 《后汉书》东郡: “卫公国, 本观故国, 姚姓, 光武更名。”^⑥ 《后汉书·光武帝纪》: “十三年……以休公姬武为卫公。”^⑦ 可见, 观县改名为卫公国实在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 非在汉明帝时期。汉观县在今清丰县南。

笔者认为瓚说可从, 第一, 自文献来源而言, 薛瓚《汉书集注》多采古本《竹书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可信度非常高。第二, 从历史形势而言, 浇灭夏后相之后, 后缙自清丰县南逃往位于济宁的母家有仍氏, 在地理位置上合乎情理。第三, 少康活动范围在有仍氏、有虞氏、纶三国, 三国皆距汉观县较近。

二是莘县观城镇说。雷学淇以为斟灌在清曹州府属县观城县西北的古观城, 雷氏云: “晋废东郡立顿邱, 改曰卫县, 见《晋书·地理志》, 后遂因之, 隋以后改观城县, 今山东曹州属县之西古观城是也。”^⑧ 顾颉刚、陈槃均从雷说。^⑨ 清观城县在今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观城镇, 位于河南范县西北、清丰东北。

三是斟灌在清丰县南五里说——兼释斟灌在观城镇说之由来。

① 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② 参见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第210页;程平山:《夏代纪年、都邑与文化》,《夏商周历史与考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28页。

③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95页。

④ 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6,第2218页。

⑤ 《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57页。

⑥ 《后汉书》志第21《郡国志三》,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450页。

⑦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第61页。

⑧ 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78页。

⑨ 参见顾颉刚:《夏代地名今译》,《顾颉刚读书笔记》卷6,第253页;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04页。

斟灌在清丰县南五里说可信，非但由于《水经注》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更是因为酈道元确凿指出斟灌在北魏的卫国县。

隋代卫国县自然延续北魏卫国县，开皇六年（586）改兖州武阳郡卫国县为观城县，自然就在清丰县南5里。唐延续隋观城县，但是宋以后观城县在隋唐观城县东70里了。《元和志》澶州观城县：“西至州二十四里。”^①《太平寰宇记》澶州观城县：“（澶州）东北七十里。”^②《九域志》澶州观城：“州东九十里。”^③《大清一统志》：“按观城以《寰宇记》、《九域志》至州近里考之，盖累徙而东，非汉唐故县矣。”^④唐观城县在澶州州治顿丘东20里，宋代观城县西至顿丘的里数越来越远，可见宋代观城县不断东徙。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理集》第2册至第5册皆将观县、卫公国、观城县标注在今河南清丰县南，第6册至第8册将观城县标注在今清丰县东、范县西北，如实地反映了观县的地理沿革。^⑤缘于宋以后观城县在今聊城莘县的观城镇，故雷学淇径直以宋清的观城县误当汉唐的观城县、夏代的斟灌，将原本在清丰县南5里的观城县断在了聊城莘县的观城镇。自此看来，清代经史学家雷学淇的治学缺少变化发展之眼光，雷氏确实不擅长沿革地理考证。

综上所述，斟灌当在清河县南。

（二）驳相居斟灌在山东寿光之说

一是驳相所居之斟灌在寿光说的直接证据。杜预《集解》言斟灌在寿光，清人雷学淇考证斟灌本在观县，相居斟灌，后迁海滨，遇澆泥之凶始覆灭也；近人杨向奎等坚信杜注以为相所居之斟灌在寿光；今人辛德勇据夏后相受羿浞之欺压不会从帝丘迁到近在咫尺的东郡观县，故进而以为夏后相居斟灌在山东寿光县。^⑥笔者认为相所居之斟灌在寿光说不可信。

第一，辛氏依据的文献证据有3条，《汉志》北海郡寿光县颜注引应劭曰：“古斟灌，禹后，今灌亭是。”《左传》襄公四年杜注：“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斟灌故城在青州寿光县东五十四里。斟寻故城，今青州北海县是也。”^⑦笔者认为上述3条证据均不能成立。应劭以汉代北海郡寿光县的灌亭是古斟灌，张守节、酈道元早已指出潍水之斟寻、斟灌为后来带入之地名，非斟灌本来所在地。依杜预《集解》之体例，凡言某地有某者多是杜氏存疑之辞^⑧；自一般语文逻辑而言，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不等于说相居斟灌在寿光，斟寻在平寿，只是表示寿光有灌亭，平寿有斟亭。唐初的《括地志》言夏代地理（尤具有争议性者）只能作为参考性意见，不能作为坚实可信的证据。

第二，自整个夏代都邑皆在河南一省而言，清丰的斟灌是夏王朝都城在豫东北之极者，几近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北道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468页。

② 《太平寰宇记》卷57《河北道六》，中华书局，2007年，第1177—1178页；

③ 《元丰九域志》卷2《河北路东路》，中华书局，1984年，第64页。

④ 《大清一统志》第4册，卷181《曹州府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26页。

⑤ 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⑥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77页；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辛德勇：《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资料的初步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第195—197页。

⑦ 《史记》卷2《夏本纪》，第107页。

⑧ 参见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6页；邹衡：《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再续集）》，第5—6页。

鲁西。寿光距离清丰足有350公里，寿光距其余夏都更加遥远。^①岂能不顾夏代都邑分布的大局面，尽以相避寒浞为由将相所居之斟灌断到海滨去了！

第三，据三代考古学的常识，二里头文化时期山东半岛的考古学文化是岳石文化，学界公认岳石文化是东夷族之文化，有夏一代二里头文化遗址没有出现在鲁西以东，据此可以彻底否定相所居之斟灌在寿光之说。

二是驳相所居之斟灌在寿光说的间接证据。相居斟灌在寿光的间接证据有二条，第一，寒浞处其子浇于过在烟台掖县，第二，有过浇灭斟寻氏于潍水之上。

其一为有过浇之过在掖县说。《左传》襄公四年言寒浞处其子豷于戈，处其子浇于过，杜注：“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②西晋东莱郡掖县在今山东省烟台市掖县。戈确实如杜注所言在宋郑之间，雷学淇进一步考证戈位于清代归德、开封二府之间，可能在杞县东北。^③但是，过确实不在掖县。

首先，根据少康活动区域可知有过浇绝非在掖县。浇灭夏后相，后缙怀遗腹子逃奔母国有仍氏，少康成人，图谋复国，寒浞、有过浇与少康实为敌人。少康活动区域在山东济宁与河南虞城一带，寒浞封长子浇于过、次子豷于戈，豷在河南杞县附近，若过在烟台掖县，不禁令人疑惑寒浞为何封浇于距离以上诸地相当遥远的海滨之地？^④寒浞处其子之地，一面必不能远离其都巩县斟寻，一面必须消灭夏后氏的残余势力少康等，故过绝非在掖县。

其次，少康为有仍牧正时，“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少康复国历程中，“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⑤。顾颉刚指出：“浇能使椒去求少康，少康也能使女艾去谍浇，可见过绝不会远在山东半岛东头的掖县。”^⑥顾氏此条理证相当可信，多不为人注意而已。

再次，如三代之礼有因损一般，三代地理自然有变动，掖县之过非夏代之过，实是周代之过。周公东征，平叛，践奄，征熊盈之族十有七国，周人统治势力始达到胶东半岛，1969年、1965年山东烟台黄县小刘庄、归城姜家分别出土一批昭穆时期的铜器。^⑦小刘庄的启尊、启卣表明胶东半岛的地方势力积极随从昭王南征。过伯簋亦属昭王南征诸器，过伯的过就是掖县之过。商代的黎国在上党壶关（今长治西南）、周代的黎国在潞州黎城（今黎城东北），周之黎国非商之黎国，故周之过非夏之过并非不可理解。

其二为“覆舟斟寻”与“冦荡舟”的真相。

《楚辞·天问》：“（汤）〔康〕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⑧《论语·宪问》：“南宫适问孔子曰：‘羿善射，冦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耕而有天下。’”^⑨今本

① 参见史念海：《中国古都与文化》，《史念海全集》第1卷，第539页。史念海早已指出：“以实际按之，寿光距夏人诸都皆显得过远。”

②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96页。

③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94—95页。

④ 参见程发轫：《春秋地名今译》，转引自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第1214页；邹衡：《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再续集）》，第5页。

⑤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79页。

⑥ 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58页。

⑦ 参见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⑧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05页。

⑨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556页。

《竹书纪年》“浇伐斟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①。明清学者多引今本《纪年》与《论语》解《天问》，缘于他们既不知今本《纪年》之伪，又多不解“荡舟”之义，故有浇与斟寻氏大战于潍水之上，浇覆斟寻氏之舟而灭之之论，此说实非。

第一，三代作战基本是陆地作战，甚少听闻有水上作战之说，又颇不知浇于水上作战之由。第二，《天问》“覆舟”一句，朱熹解释说：“覆舟，言夏后相已倾覆于斟寻之国，今少康以何道能复取浇乎？”^②朱熹解“覆舟”为“倾覆”远胜“荡舟”“覆其舟”之说。第三，《论语》以羿荡舟与羿善射并言，荡舟当指一种高超的技艺，明代汪瑗已认识到：“（浇）多勇力，‘羿荡舟’，是也。”^③顾炎武考证说：“古人以左右冲杀为荡陈，其锐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荡舟’盖兼此义，与蔡姬之乘舟‘荡公’者不同。”^④“羿荡舟”不过是言浇特别勇猛，善于冲锋陷阵。

《淮南子·地形》：“维出覆舟。”^⑤一般多认为浇与斟寻氏战于潍水之上，浇覆败斟寻氏之舟之处就在潍水发源地，故潍水所出之箕山又名覆舟山。《淮南子》成书已晚至西汉，其说不可完全信。我认为浇灭斟寻氏于潍水是历史传说，潍水发源之山名曰覆舟是由传说造成的。少康复国必要从虞城西进巩县，浇与少康在巩县斟寻发生了一场大战斗，结果以冲锋陷阵闻名的浇给战死了。少康复国之后，夏人向东方开拓相当突出，待及夏代中期后段，夏人在国力上对东夷取得相当大的优势，有一部分斟寻氏的夏人或二里头文化区的人东徙至潍水流域，潍坊始有斟寻之名，他们将少康与浇在巩县斟寻作战的故事带入潍坊，又将故事的发生地从巩县的斟寻搬到了潍水流域的斟寻，又加以演绎说浇败斟寻氏之地正在潍水发源地，于是潍水所出之山又名覆舟山。

《水经·潍水注》：“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又东北入于潍，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⑥这应是后来附增之传说，酈道元言之不过保存异说而已。《汉志》在北海郡下属县列淳于之名，并无班固之自注，应劭、臣瓚的注解亦未尝言一字，汉晋学者未以淳于为斟灌。虽不知酈氏所录异说之源，然可知此不足信也。

四 斟寻、斟灌自河南披名于潍坊、寿光的历史形势

太康所居之斟寻在河南巩县西南，后相所居之斟灌位于河南清丰南，那么潍坊、寿光的斟寻、斟灌岂是无源之水？酈道元、张守节已经指出：斟寻在河南，后迁北海平寿，斟灌在观城，后迁北海寿光。^⑦族群的迁徙造成地名的迁移。雷学淇说：“自太康居寻，而寻迁平寿，今后相居灌，故灌亦迁寿光也。”^⑧雷氏将斟寻、斟灌出现在潍坊、寿光的时间提地过早了，那么在何种历史形势下巩义、清丰的斟寻、斟灌披冠于潍坊、寿光？此问题的解决，一是需要从文献记载的夏代都邑来对夏人的政治中心与夏人发展方向作出总体判断，一是需要结合夏代考古资料检验相关文献记载是否可靠。

①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遗书》第8册，第22页。

②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9页。

③ 汪瑗、汪仲弘：《楚辞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12页。

④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11—412页。

⑤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2017年，第183页。

⑥ 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6，第2262页。

⑦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2《夏本纪》，第107页。

⑧ 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92页。

（一）夏代都邑与夏人政治中心

一是自夏代都邑知夏代政治中心未出河南一省。古本《竹书纪年》较为全面地记载了夏代都邑，据此可对夏人的政治中心及势力范围作出准确判断。《汉志》颍川郡阳翟县颜注引臣瓚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①阳城为大禹避舜子商均所居之地，在今登封市王城岗镇王城岗遗址。^②太康、羿、桀居斟寻，斟寻在巩义市西南芝田镇稍柴村与小訾殿村一带。相居帝丘、斟灌，帝丘在濮阳西南，斟灌在清丰县南5里。《太平御览》引《纪年》曰：“帝宁居原，自〔原〕迁于老丘。”^③“胤甲即位，居西河。”^④原在今河南济源西北^⑤，庙街遗址与之相符^⑥，老丘在今河南开封东北^⑦，胤甲之西河在安阳、内黄一带。^⑧

三代国家都城体制是多都制，如盘庚迁殷以后安阳殷墟为商王朝的都城，安阳殷墟是纣王的正都，淇县朝歌是纣王的别都。^⑨西周王朝的正都是宗周与成周，王朝统治中心实在成周，周穆王居西郑、懿王居犬丘，西郑、犬丘是周天子设立的别都。少康中兴以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的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的正都，原、老丘、西河、斟寻（桀都）是夏后氏设立的别都。自夏代都邑的分布，可见夏代政治中心未曾离开过河南一省。

二是山西之大夏夏墟之名为夏亡后夏遗民逃奔所至之地。学者据晋南有大夏、夏墟之名以为夏代政治中心或夏人统治范围达到了晋南，故必须讲明白晋南何时有大夏、夏墟之名以及有夏一代夏人势力是否达到晋南。

夏人统治范围达于晋南说的文献证据有二。第一，晋国为大夏之故墟，《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载祝佗之语云：“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而封于夏墟。启于夏政，疆于戎索。”^⑩昭公元年（前541）载子产之语云：“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因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⑪第二，皇甫谧言桀都安邑，商汤夏桀决战之鸣条在安邑西。《尚书·汤誓》孔颖达疏引皇甫谧云：“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昆吾亭。”^⑫《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曰：“禹自安邑都晋阳，至桀徙都安邑。”^⑬《续汉志》河东郡安邑刘昭注引《帝王世纪》曰：“县西有鸣条陌。汤伐桀，战昆吾亭。《左传》昆吾与桀同日亡。”^⑭

皇甫谧言桀都安邑最不可信，金鹗、雷学淇彻底驳斥皇甫谧桀都安邑之说，力证鸣条在陈

① 《汉书》卷28《地理志》，第2560页。

② 参见程平山：《登封王城岗遗址性质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③ 《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七》，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384页。

④ 《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七》，第385页。

⑤ 参见顾颉刚：《夏代地名今译》，《顾颉刚读书笔记》卷6，第253页。

⑥ 参见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19页

⑦ 参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775页。

⑧ 参见钱穆：《子夏居西河在东方河济之间不在西土龙门汾州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册《先秦诸子系年》，第147页；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高代前期青铜器谈起》，《唐兰全集》第4册《论文集下编（1972—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52页。安阳相隔一条卫河，内黄在安阳东南。

⑨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页。

⑩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5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37页。

⑪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93—4394页。

⑫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38页。

⑬ 《太平御览》卷163《州郡部九》，第794页。

⑭ 《续汉书·郡国志一》，《后汉书》，第3397页。

留，桀都在河南洛阳^①，此诚为不易之论。夏桀都城实有二，一是别都斟寻；一是正都洛阳，《逸周书·度邑》《战国策·魏策一》《史记·吴起列传》言之详矣，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二里头遗址。

族群名前冠有大小常常表示新旧^②，旧日、本支称小，新近、分支称大，曲阜的少昊族发展为淮阳的太昊族；地名前冠有大小往往表示新旧^③，战国魏自安邑徙都开封，陕西韩城之梁（少梁）在前，河南开封的大梁在后。虞城有夏墟之称，山西汾浍之间有大夏之称。夏在前，大夏在后，夏发展分化出大夏。大夏之称在夏王朝灭亡前抑灭亡后产生，一以夏朝灭亡前夏人已发展至晋南，称其国为大夏，其地后称夏墟。^④一以夏朝灭亡后夏遗民逃奔至晋南，称其国为大夏，其地后称夏墟。顾颉刚云：“总合其一代观之，夏都不可能在今山西。故山西之为大夏，必在夏亡之后。”^⑤又云：“予甚疑夏亡之后，桀固南放，而其王族则北至汾水流域建立新国，仍号大夏；其后又亡，其遗址以夏墟称之。”^⑥上文考证夏代的都邑分布范围知夏代政治中心不出今河南一省，晋南在夏人统治范围内之说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以考古资料而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晋南地区的文化是东下冯文化，过去曾称东下冯文化为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⑦，后来研究表明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存在本质区别，东下冯文化是在当地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独立的文化^⑧，故有夏一代夏人未能发展至晋南可为定论，顾颉刚所持晋南大夏、夏墟为夏亡后夏遗民逃居地之称的认识会逐渐为学界广泛接受。

周人崛起于公亶父迁岐下之后，周人自称其地为“我区夏”“我有夏”^⑨，关中平原的周人为何自称有夏？顾颉刚以为：“周人自称为夏，乃是夏为商灭之后遗族西迁的结果，正和商亡以后，武庚北迁，空桐西北迁，亳王西迁有类同的情形，我们不应该倒果为因，而说夏、商都起于西方。”^⑩其说可从。

自历史经验而言，由于诸多原因造成河洛大平原的居民被迫迁徙而远离故土，其迁徙路线基本可分为北走汾水谷地与西走渭水谷地两条。文献中汾浍之间、渭水盆地之“大夏”“夏墟”“有夏”称谓是夏亡以后夏遗民逃亡至此而始有，故有夏一代夏人的政治中心未出河南一省可为不易之说。

（二）夏人向东发展及斟寻、斟灌披于潍坊寿光之历史形势

一是自传世文献看斟寻、斟灌披于潍坊、寿光的历史形势。夏代的政治中心未曾能跨越河南

① 参见金鹗：《求古录礼说》卷8《桀都安邑辨》，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第480—491页；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121、130—131页。

② 参见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第34页。

③ 参见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30页。

④ 参见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34页。邹衡等意见与徐氏相近，见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第217—219、232页。

⑤ 顾颉刚：《法华读书记》（十四）《夏都均在河南，山西之为大夏当在夏亡后》，《顾颉刚读书笔记》卷6，第26页。

⑥ 顾颉刚：《法华读书记》（十四）《桀居河南，昆吾在许，鸣条在陈留，三鬲在定陶，均与安邑无关》，《顾颉刚读书笔记》卷6，第25—26页。

⑦ 参见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⑧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6—254页；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学集刊》第10辑，地质出版社，1996年；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第2版），第69—72页。

⑨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4、卷16、卷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1页、第477页、第491页。

⑩ 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30页。

一省的范围，然并非夏人不积极向四周开拓。自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夏人与东夷往来频繁之事迹，可知夏人不断向东方扩展。《太平御览》引古本《竹书纪年》：“（帝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① 淮夷指淮夷，此为相为羿浞所迫而向东发展。《后汉书·东夷列传》李贤注引《竹书纪年》曰：“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三〕寿，得一狐，九尾。”^② 《后汉书·东夷列传》李贤注引《竹书纪年》曰：“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即位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③ 自《纪年》知夏后芬、后荒、后泄在位时期为夏王朝的鼎盛期，夏人在国力上对东夷当是占有较大优势，故能使得“九夷来御”，“命”诸夷，以至于在后发时“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诸夷来朝非简单之觐见，且当有对夏人之贡献，实是臣服之表现。夏人与东夷的关系绝非是单纯之对立关系，似乎夏人被东夷奉为共主。斟寻、斟灌东披于海隅，绝非自太康至少康的某一王即可完成之事，当与夏人向东发展极其有关。少康复国以后，夏人向东发展势头甚为强劲。夏人东展之势非达一定之高度，则山东潍坊、寿光不得有斟寻、斟灌之名。唯有夏王朝在后芬、后荒、后泄时期达到鼎盛期，伴随政治势力之推进与人物之往来，原巩义的斟寻之名东披于海隅潍坊，原清丰南的斟灌之名东披于海隅之寿光。

二是从考古资料佐证文献分析之结论。

山东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比二里头文化稍晚，岳石文化早期、中期早段、中期晚段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中期早段或稍早、中期晚段、晚期。二里头文化时代，山东的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处于并立的局面，虽然是并立与对峙，但是实际上它们的交流相当频繁与密切。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国大地上，以夏后氏为核心的姒姓族联合其他归附的异姓族形成的夏王朝之力量最为发达与强盛，故二里头文化对岳石文化的影响要大于岳石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虽然鲁西以东没有发现一个二里头文化遗址，但是在山东的黄河以南胶莱河以北的岳石文化遗存中，发现数量不等的二里头文化陶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岳石文化的早期遗存中明显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数量很少，等到岳石文化中期（二里头文化中期晚段），岳石文化中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种类和数量猛增。^④ 这显然表明二里头文化对岳石文化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此时期夏人与东夷往来相当密切，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按照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皆为夏文化之说，二里头文化中期晚段相当于夏后芬、后荒、后泄、不降时期。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后芬至不降四王时期夏人在国力上对东夷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故九夷来御，命诸夷。此时期岳石文化中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在种类和数量上的猛增，从考古学资料无疑印证了文献记载夏代中期后段夏人向东扩展达到了顶峰。

潍坊市青州郝家庄遗址 H58: 3 的器表上杂乱的细绳纹展现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特征在岳石文化器物的上有所反映。^⑤ 山东潍坊市昌乐县邹家庄遗址发现有不少的二里头文化陶器，表明二里头文化陶器直接到达潍水流域的岳石文化区。这个现象不是制陶技术的传播可以解释得通，应当是有

① 《太平御览》卷 82《皇王部七》，第 383—384 页。按，淮夷读淮夷。

②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中华书局，2020 年，第 267—268 页。

③ 本段所引《后汉书》出自同一页，《后汉书》卷 85《东夷列传》，第 280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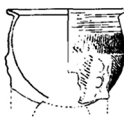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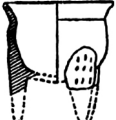
④ 参见段天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76—377 页。

⑤ 参见段天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国》，第 377—378 页。

一部分二里头文化区的人来到了潍坊一带。潍坊、寿光有斟寻、斟灌之名应当就是此时期来到潍坊一带的二里头文化区的人将旧地名带来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人向东开拓发展的历史。

虽然夏王朝在内黄、开封东设有别都，夏人与东夷特别密切的往来，夏后氏似被东夷当作政治上的共主，二里头文化陶器直接传播到潍水流域的岳石文化区；但是在二里头文化扩张的巅峰时期二里头文化遗址在鲁西以东的岳石文化区一个也没有。这表明夏人虽然一直努力向东发展，但是由于某一方面因素的限制，夏人东展之势力始终不能跨越豫东北达到鲁西。如果将夏代中期二里头向东发展、早商二里岗文化的大扩张、西周早期周公东征之后齐鲁燕卫等封国在东方的建立相比较，不难发现夏人向东发展受限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夏人武功有限。

表1 岳石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影响举例^①

二里头文化			岳石文化时期			
中期	晚段	 1 2 3	中期 早段	 1 2 3 4		
中期	早段	 4	早期	 5		

说明：二里头文化：1. IVH57：98 2. VIIIIT15^③：12 3. IVT11^④：13 4. IIVH117：12

1—4 偃师二里头

郝家庄：1. H6：81 2. H6：68 3. H6：70 4. H9：23 5. H17：8 1—5 青州郝家庄

三是关于考古资料所见二里头文化中的东方因素问题。

邹衡从溯源的角度指出带有礼器性质的二里头文化陶器：“觚、爵、鸡彝、瓦足皿等四器中，大都来自东方，或者同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② 邹衡后来进一步解释说：“我是着眼于觚、爵、鸡彝的组合关系而言”，“二里头文化中的觚并非从山东龙山文化直接传来，而是直接出自河南龙山文化”^③。众所周知，邹衡持夏文化起源豫西说，个别学者心中先有夏人起源东方说的先见，或采用邹衡的讲法以证己说，这是不妥当的。

考古学文化因素是可流动、可吸收、可兼容，文化流动的方向基本是从强势者向弱者渗透、灌输、改造，如早商二里冈文化的大扩张应当是商王朝政治军事扩张的产物，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有夏一代，二里头文化是中国大地上最强势的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王朝的都城。二里头文化有东夷文化的因素或色彩，这只能说明夏人有选择性、有改造性地吸收了东夷

^① 该图摘自段天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国》第377、151页，有所调整。偃师二里头的图片依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11、217、215、101页；青州郝家庄的图片来自吴玉喜：《岳石文化地方类型初探——从郝家庄岳石遗存的发现谈起》，《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70—310页。

^② 邹衡：《关于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第153页。

^③ 邹衡：《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再续集）》，第7页。

文化；若是据之进一步认为夏族起源鲁西南豫东北，那就有误。中国古代王朝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都有强大的吸附能力，将王朝统治范围的各种绝佳的物质及精神产品都能吸纳进来。既然二里头遗址二至四期是夏王朝的都城，那么就可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吸纳夏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族群的文化以及非统治范围内东夷族的文化，亦可以招徕四方之民来到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故二里头文化具有一点岳石文化因素相当正常。

小 结

太康所居的斟寻在河南巩义西南芝田镇的稍柴村与小訾殿村一带，二里头遗址不是斟寻，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的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的都城。后相所居的斟灌在河南清丰县南5里，宋以后的观城县往东迁徙了70里，山东聊城莘县的观城镇不是汉唐的观城县，也就不是夏代的斟灌之所在。

夏王朝政治中心确实未曾跨越出河南一省，但是据古本《竹书纪年》可知夏人与东方民族往来密切，有夏一代尤其少康中兴以后夏人向东发展突出，夏王朝在夏后芬、后荒、后泄、不降四王时期国力达到鼎盛，夏人对东夷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正在此时期，原来河南巩县的斟寻、清丰的斟灌才能披名于山东潍坊和寿光。二里头文化中期晚段的岳石文化中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种类和数量猛增，基本可以佐证据文献考证河南的斟寻、斟灌披于山东潍水流域发生时间的判断。虽然夏人努力向东开拓与发展，但是夏人实际统治区域难以跨越豫东北达到鲁西，二里头文化遗址不见于鲁西以东地区。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出版

《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本书作者为美国学者戴思哲（Joseph Dennis），原书名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5年出版。译者向静，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该作是英语世界系统研究中国地方志的重要著作，采用书籍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考证细致，材料丰富，并有诸多新论。全书主体部分共7章。第一章简述方志的流变和官方（既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修志的动因；第二章介绍地方社会修志的动因，特别关注地方家族势力对修志的影响；第三至五章从生产制作角度对方志进行研究，分别探讨了方志的编辑、出版过程，以及修志经费问题；第六章讨论方志的目标受众，并从手抄、印刷、官府收藏、二手书市场等角度研究方志的传布；第七章在传布的基础上研究方志的阅读情况，对旅居者、旅行者、文人等不同群体阅读方志的情况进行分析，并讨论利用方志进行家谱研究、搜集诉讼证据等案例。

(王笑涛)